

無的觀念，不僅讓佛教史家得以輕易超克長期困惑前者的「德命不一」難題，更擔保他們能從看似無章的過往中找出律則，從而使其確信自己擁有勝過宮廷史家之長。這也正是中國佛教歷史書寫得以長存不斷的基礎。

惟如最末章〈現代性〉所言，以上論及的所有書寫特徵，均在 20 世紀建立起的近代學術衝擊下被盡數揚棄，而儘管其後有太虛、印順等高僧嘗試建立起一能縮合學術標準及佛教關懷的新型佛教歷史書寫，然在聖嚴法師開啟了僧尼讀博風潮後，教界的佛教歷史書寫仍逐步被吸納進學界佛教歷史書寫之中，再難維持獨立地位。在最後的〈結論〉部分，作者回到他在〈導論〉提出的四大觀察主軸，主張中國佛教史家在深受傳統史學影響而展現出強烈編年排序傾向的同時，又極富創意地運用教義來解決、闡明歷史問題，以求爭取支持、推廣佛教；但在實際書寫時，又不願輕易地為功利意圖犧牲史學標準，從而讓佛教歷史書寫形成一套獨樹一格的史學技藝。

通過作者悉心挑選的幾大主題，本書確實通過佛教史家的撰作視角，為讀者提供一幅得以全面掌握中國佛

教歷史書寫特質的圖景，貢獻匪淺。然似也因為主題式的編排，使得本書討論較不易呈顯出歷時性變化。本書提及幾個基於史學立場駁斥前賢所用材料的例子都出現在宋代（如頁 67-68、75-76、153-155），讓人好奇宋代佛教史家是否較此前更加擁護史學原則？作者自己顯也意識到此侷限，特在〈導論〉與〈結論〉先後提出一簡要的三段式發展，即：以「僧傳」類作品為主的早期階段（400-1000），以「系譜」類作品為首、略晚成熟的「全史」類作品為輔的中期階段（1000-1900），和整個趨向近代化學術的晚期階段（1900-）。然綜觀全書徵引的核心材料，即可發現所占時間最長的中期階段實未獲得同等比例的關注，在本書附錄一臚列的主要徵引著作表中（頁 203-208），屬早期的有 17 部、中期的有 12 部、晚期的有 9 部。事實上，中期後段湧現出大量的「佛寺志」類作品，然本書全未提及，殊為可惜。此類作品的興起過程可見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然瑕不掩瑜，本書仍稱得上是佛教史籍研究的新里程碑，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友切不可錯過！（黃庭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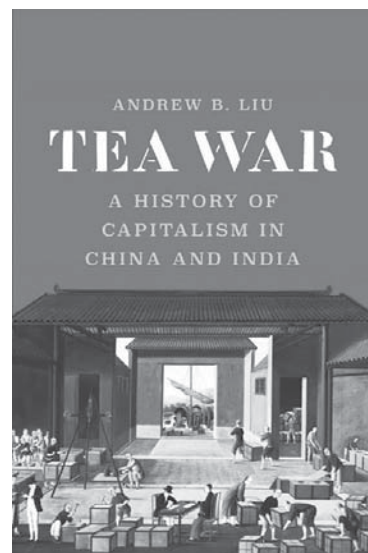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Andrew B. Liu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320 pages, ISBN 978-030-0243-73-4

本書作者劉仁威（Andrew B. Liu）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現為維拉諾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近年來，其致力於將近現代中國史置於全球史、亞洲跨國史、政



治經濟學的背景下來考察，並試圖以此探究不同地區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茶葉作為中國和英屬殖民地印度出口經濟中最具象徵意義的商品之一，就這樣走進了作者的視線。本書以茶葉的生產、流通、消費為線索，講述了18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中葉，中國與英屬印度之間圍繞茶業進行商戰的歷史。

在此過程中，作者強調了兩方面的變化：首先，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以中國小農以及印度契約工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模式在資本積累中發揮了核心作用，這與舊有觀念相矛盾，促使人們對以自由市場、自由勞動力為特徵的資本主義內涵重新進行思考。其次，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與印度的茶戰參與者從自身實踐出發，將原本抽象的生產、勞動、價值等西方概念具象化，其與當地已有秩序相融合，由此闡發出一套新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是發達國家以外政治經濟發展的新案例、新模型。

本書共有7章，除導論與結論外，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包括2至5章，概述了中印兩國茶業發展及相互競爭的歷史過程。鴉片戰爭後，在全球茶葉需求上升、價格暴跌的市場壓力下，由於缺乏尖端技術，安徽、福建兩省的茶葉生產商更加強調對生產的控制，通過調整勞動時間、提高勞動效率等手段，形成了勞動密集型資本積累的策略。與「內卷化」的觀念不同，勞動集約化不是由人口過剩和土地質量下降等自然因素驅動的，而是由要求以較低成本獲得更大產出的社會趨勢驅動的，具有高效、創新的現代工業化特徵。與此同時，為了減少對中國茶葉市場的依賴，英國資本家嘗試在印度殖民地阿薩姆邦創辦茶業。在吸引中國移民的計劃失敗後，英國方面放棄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開始在阿薩姆邦實行契約勞工招募制度，效果顯著，使得印度在茶葉競爭中佔據優勢。19世紀80年代，印度茶業崛起，中國茶業相對衰落。這不僅引起了晚清官員的重視，也促成了晚清經濟思想家的思想轉變。他們在對競爭對手的觀察與審視中，發現了中國方法的不合時宜，從而試

圖將改革重心逐步從商業流通轉向勞動生產領域。在吸收西方古典價值理論的基礎上，最終形成了一套相類似地且適用於中國的價值理論。

第二部分包括6至7章，考察了西方政治經濟學對近代中國與印度的影響程度，以及兩國的思想家又是如何以自身利益為導向對該學說進行挪用與再闡釋的。19世紀末，英屬印度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開始質疑種植園中實行的契約制度是「不自由」的，茶葉「苦力」（coolies）是被奴役的，正是這種批評引發了20世紀初印度廣泛的經濟政治自由以及非殖民化運動。同樣地，在中國，茶商的形象也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自強運動時期作出重要貢獻的資本主義先鋒人物，到20世紀初卻被譴責為寄生的「買辦」（compradors），這在一定程度上服務於當時的民族運動，也是政治團體的宣傳口號之一。中國的改革家們試圖消滅買辦，提高農民地位，進而加強民族工業，農村合作社的推廣就是這一思想的產物。種種跡象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儘管中國與印度茶葉之間的直接競爭已經消退，但勞動密集型的資本積累模式卻得以延續與復興，且為各地民族主義思想的誕生奠定基礎，茶葉戰爭的號角依舊在耳畔回響。

本書作者對標彭慕蘭在《大分流》中的宏偉目標，挑戰了傳統思維下東方經濟落後的觀念，為現代經濟的崛起提供了新結論，即落後與邊緣的社會有時會比中心城市更傾向於工業生產，這與著名社會經濟史學家傅衣凌的觀點不謀而合。除了關注具體的歷史過程之外，作者還進一步將其抽象化、思想化。從根本上來說，現代資本主義從來都不是完全「西方」的，而是一個在歷史實踐中、在思想演繹中具有全球性特徵的動態概念。由此，近代中國與印度在茶葉貿易中相互競爭的歷史也只不過是全球故事的兩個組成部分，其他後殖民地地區，如美洲、非洲、中歐、中亞和東南亞等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同樣具有探究的價值，是討論經濟全球化以及重新闡釋資本主義概念的有益切入點。（崔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博士生）